

# 代绪论

## 彝族历史地理的多学科研究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空间分布、时空演变以及有关要素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的辅助学科。其主要研究任务包括：确定各个时期的民族区域范围，分析各个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以及由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问题。<sup>①</sup>

在中国，由于受封建史家中原王朝正统思想的影响，历史文献中有关民族地理的记载比较稀少，我们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必须运用多种相关或相邻学科的方法、手段、观点、知识、成果，否则很难有所突破。下面结合彝族历史地理研究状况，谈一谈自己的心得。

### 一、彝族历史地理研究现状

彝族古有昆明、乌蛮、罗罗等称呼，至少有两千多年父

<sup>①</sup>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第1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系氏族社会史。唐代中后期，云南的乌蛮酋长建立了南诏政权，统治云贵高原达两百多年。其后贵州的乌蛮又相继建立了罗施、罗甸、自杞等民族政权，彝族社会有所发展。然而在元、明、清时代，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高压政策，彝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日益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但由于历史因素的长期影响及居住地自然条件限制，其社会经济文化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现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研究彝族历史地理，弄清古代彝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部落人口、交通状况、文化遗存等情况，可以为彝族地区旅游规划、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地理依据。近年学术界兴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也有必要对彝族历史地理的现状与发展作一探讨。

国外对彝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神话、历史语言与原始宗教方面，很少涉及历史地理。法国学者 A·F·吕真达的《华西的土著民族——俾俾人的人种学研究》（1909年）及《建昌俾俾》（1911年）、日本学者齐藤达次郎的《罗罗族的洪水神话》（1963年）、澳大利亚学者 D·布莱德雷的《彝语支源流》（1979年）为其代表作。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著《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1981年）是仅有的南诏史研究专著。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学者郝瑞、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发起，召开过两次国际彝学研讨会，我国也出版了《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国际彝学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对古代彝族的研究，重点在于彝族史与彝族文明史，主要专著有任映沧《大小凉山俾族通考》，谢世忠《俾

傩族的初步研究》，方国瑜《彝族史稿》，马长寿《彝族古代史》、《彝族简史》，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刘宇《凉山彝族英雄时代》，易谋远《彝族史要》，陈本明《昭通彝族史探》，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等。其中，方国瑜、马长寿、易谋远三人对彝族历史的研究较为深入，对彝族源流及古代部落分布提出了不少创见。涉及彝族地区地理状况的论著则较为少见，主要有郭有守《雷马屏峨纪略》、管中天《小凉山树木图志》、凉山州计委的《凉山州国土资源》、仰协的《凉山经济地理》等，且多为资料性质。

民国以来，一些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论著如童振藻《云南地震考》、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江应梁《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于希贤《滇池地区历史地理》、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龚荫《中国土司制度》、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方铁《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等，涉及彝族历史地理的某些方面，但篇幅都不太大。

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关怀下，有关部门大力开展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整理彝族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彝族历史地理研究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 （一）关于彝族地区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

彝族地区的政治地理，包括历代王朝在彝族地区的施治情况，其中以唐宋羁縻州、南诏国政区和元明清土司研究尤为重要。

方国瑜在其专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对唐代置于云南的羁縻州和南诏政区有较详细的沿革和地望考证，勾画了大致分布范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部分多用其说，但也有一些分歧，如谭著《关于隋南宁州总管府唐剑南道的南界问题——答云南大学来件〈隋代初唐南诏三幅图在爨地南部的边界线〉》即为商榷讨论文章之一。<sup>①</sup>刘统的专著《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在上述基础上，对戎、姚二州都督府管内羁縻州地望的研究有新的进展。此外，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史继忠《试论西南边疆的羁縻州》两文<sup>②</sup>，概述了彝族地区羁縻州的设置过程。郭声波《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沿革再研究》、《唐代黎属羁縻州研究》、《唐代嵩属羁縻州及其部族研究》、《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唐代金沙乌蒙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唐代滇池秦臧地区羁縻州县研究》等文<sup>③</sup>，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详细考证了一些地区乌蛮等族羁縻州的设置过程和具体地望。

①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2期。

② 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4期、《思想战线》1989年5期。

③ 分别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2期、2009年1期。

何耀华的论文《凉山土司考索》，考证了元明以来凉山彝族地区土司建置始末，《关于元初罗罗斯宣慰使的设置问题》一文，认为元代罗罗斯宣慰使只能由落兰部的统治家族来担任，不可能由多家担任。<sup>①</sup> 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总府建置考》，辨析了清代史家之误，指出元代确曾在凉山设立过罗罗斯宣慰司都元帅府。<sup>②</sup> 刘顺良的《昭通地区的建置沿革考》，概述了滇东北彝族政区沿革情况。<sup>③</sup> 龚荫的专著《明清云南土司通纂》，对明清云南众多彝族土司的建置沿革、族属及地望作了考证，比较全面。

关于彝族政权疆域与政区的论文主要有陈天俊的《罗施鬼国考》，尤中的《关于南诏的政区建置问题》、《南诏疆域的发展和郡县的设置》，王燕玉的《辨罗甸国与罗氏鬼国》，胡克敏的《唐代黔中地区的罗殿国》，李志高的《六枝为宋罗甸国罗氏鬼主疆土考》等。<sup>④</sup>

## （二）关于彝族源流与部落分布的研究

彝族源流向来是研究的重点。方国瑜的《彝族史稿》、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虽是彝族史研究专著，但他们对彝族源流与部落迁徙路线的关注程度以及考证深度给我们以深刻印象，可以将他们看做是彝族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至于论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

① 分别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2期、《思想战线》1984年2期。

② 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1期。

③ 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4期。

④ 分别载《思想战线》1981年3期、6期；《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贵州史专题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3期；《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5期。

刘尧汉的《彝族的主要源流——唐代滇西乌蛮中的顺蛮、南诏、磨弥、罗件及仲牟由》一文及杜玉亭的商榷文章，对彝族源流问题进行了讨论。<sup>①</sup> 70年代，李绍明的《关于凉山彝族来源问题》一文指出凉山彝族源于氐羌，又与余宏模合撰《关于东爨乌蛮诸部的族源关系》，论证东爨乌蛮诸部与彝族有直接的族源关系。<sup>②</sup> 80年代，又有关荣华《试论古蜀人的迁徙与西南各族的融合——兼析彝民的形成》、黄飞《播勒历史与普底彝族族源》两文参加讨论。<sup>③</sup> 蒙默的《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则认为彝族是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从旄牛徼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与濮人为主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sup>④</sup>

关于彝族部落分布与迁徙的论文，有余宏模《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罗希吾戈《彝族六祖分支刍议》、孙华《卢族的西迁与彝族关系考》、伍合尔基《凉山彝族氏族战争》、孙定朝《从系谱资料看古代西南地区彝族的迁徙方向》等文，分析了贵州、四川、云南各地彝族部落迁徙过程<sup>⑤</sup>。蒙默《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追溯唐代东蛮三部落中乌蛮的来源，认为其是由东汉后期汉嘉郡界、灵关、阆县、苏祈等地的旄牛夷迁徙而来。<sup>⑥</sup> 范宏贵《中国彝族进入越南一分为二》，则探讨了中国彝族进入越南的时间及其分

① 分别载《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5期、7期。

② 分别载《思想战线》1978年5期、1979年4期。

③ 分别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2期、《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4期。

④ 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分别载《夜郎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思想战线》1983年1期；《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1期；《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文献》1989年1期。

⑥ 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布状况。<sup>①</sup>

### （三）关于彝族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的研究

朱圣钟的专著《历史时期凉山彝族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深入探讨了土司制度时期四川凉山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指出清代是人为活动对凉山地区植被的变化产生剧烈影响的时期，自元至清灾害发生呈明显上升趋势，除自然因素的作用外，人为活动的加剧是影响灾害的重要因素。张瑛的专著《西南彝族服饰文化地理》认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彝族服饰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彝族服饰的形成和发展与特定区域内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差异、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状况、自然崇拜等因素有关。这两本彝族部门历史地理专著为目前所仅见，填补了彝族历史地理、彝族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空白。

### （四）关于彝族历史城镇、聚落地理的研究

彝族历史城镇、聚落地理研究，主要有一些彝族地区古城址调查研究的论文，如黄承宗《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古城址调查记》、林声《南诏几个城址的考察》、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等<sup>②</sup>。20世纪90年代，贵州学术界展开了古城阿札遗址性质的热烈讨论，陈天俊《罗殿国都邑与阿札城遗址》、史继忠《罗殿国与阿札遗址》、余宏模《阿札城垣遗址和彝族播勒大革》、李平凡《贵州安顺古代彝族与安札古

<sup>①</sup> 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1)，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sup>②</sup> 分别载《凉山奴隶制研究》1982年1期；《民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4期。

遗址》、王正贤《彝族呗勒大宗初探》等，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比较一致地认为该城属于古彝族政权罗甸国。<sup>①</sup>

### （五）关于彝族历史地名的研究

关于彝族历史地名研究的论著，在吴光范的专著《话说云南——沿着地名的线索》和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编纂的工具书《彝文古籍释名集》中有较多的涉及，一些重要古彝语地名的地望得以厘定。李世忠《彝语古地名汇编》、朱琚元《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巴莫阿依《凉山彝语地名初探》、胡正宇《凉山彝汉共居地区地名初探》等文，应用彝语本义解释并研究凉山一些地名，具有开创之功。<sup>②</sup>

## 二、彝族历史地理研究方法

### （一）地理学、地图学研究方法

在地理学研究方法中，对历史地理工作者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田野考察，主要目的是对研究结果作选样或抽样验证。

宋人云：“两林部落，东蛮国也，去勿邓国七十里。”<sup>③</sup>自勿邓部南界（今越西县南界瓦吉木梁子）南行七十里，即

① 均载于《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3期、1992年1~3期。

② 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1期；《彝族文化研究文集》，云南省社科院楚雄文化研究所1985年版；《民族研究》1987年5期；《地名知识》1988年4期。

③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资治通鉴》卷二五〇胡三省注引。

今喜德县且拖乡一带。但以且拖一隅之地，能否作为两林部落统治中心，尚属疑问。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且拖乡为一较宽河谷，并且地当唐后期嵩州驻地台登县与凉山腹地交通要道，作为苴货部（两林蛮本部）酋长驻地是具备条件的。清溪道（自四川汉源县经越西县至西昌市）是唐与云南联系的主要通道，古人何以选择这条路线，而不走现今的108国道（自汉源县经石棉县至西昌市）？笔者沿两条道走了一遭，发现清溪道大渡河以南的土路虽已基本废弃，砾石、泥泞遍地，但尚可通行车辆，并无高山大河阻碍，而108国道却需凿通石棉县大渡河峡谷，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小相岭，艰苦程度远远超过清溪道，由此可以理解古人选择交通路线的合理性。

有些地区已经有专家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写有考察报告，如民国时期马长寿、林耀华的民族学考察，常隆庆的地质学考察，曾昭伦、陈宗祥的社会历史考察，以及一些外国学者、探险家的考察记述，都是可资利用的第一手资料。

根据现代精确的交通路线图、地形图，充分利用古文獻记载的道路里程数据，推断古代彝族羁縻州县的地理位置，也是我们得以超过古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旧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旧唐志》）载有唐初南宁州都督府所领爨蛮羁縻州的道里数，这是经行石门旧道得出的数据。石门旧道长一千五百六十六唐里，现代地图标注的里程为629公里，由此可知，在唐代川、云、贵交界地区，一唐里 $\approx 0.4$ 公里。笔者用它来将《旧唐志》、《太平寰宇记》（以下省称《寰宇记》）所载该地区各羁縻州道里数折算成今公里数，然后判断它们经由的路线，再用现代交通图、地形图推考其具

体所在，基本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如爨部的品州，用上述方法取石门旧道—滇越东道，可断定在今云南蒙自县城西土官村，这个结果与方国瑜据地名分析所得的结论完全相同（详见第二章第三节“品州”条）。

地形图的正确使用，对军事据点、政区治地、交通路线、河湖变迁的确定也很有帮助。如唐代属乌蛮部落有大、小龙池部，笔者据文献判断大龙池指今雷波县之马湖，小龙池初不知其所指，然按之 1:50 万地形图，发现今雷波县城附近另有一高山湖泊——落水湖，小龙池由此找到了归属。

数量统计与分析方法，可用于历史民族人口数、耕地、森林面积、水利设施、灌溉田亩、灾害频率等可量化要素分布与演变的研究。

朱圣钟的研究报告对清嘉庆年间凉山彝族土司耕地进行了统计，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总计彝族土司地区的耕地约有 2083680 亩，较宁远府各厅、州、县直辖区内的耕地数要少得多，这种情况与土司辖区的范围宽窄有较大的关系；在众多的土司辖区内，阿都长官司等三个土司辖区内耕地数相对较多，这与各土司辖区内的人口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大小凉山土司区耕地数量来看，大凉山地区由于土司分布数量比小凉山地区多，土司控制的人口数量也较多，因而大凉山土司地区的耕地数要比小凉山土司地区的耕地数多得多，这种情况刚好与大小凉山各厅、州、县直辖区耕地数量的分布情况相反。<sup>①</sup> 报告又说：唐宋以前凉山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在

<sup>①</sup> 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第 91 页，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

80%以上，经过持续的经济开发，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森林资源更是以加速度减少，到1943年凉山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到16.85%左右。可见从总体上说经济开发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是很严重的。<sup>①</sup>该报告还统计出，清末凉山彝族地区的集市总数达312处，这比元、明时代的集市数量都多，从集市总体分布来看，不仅在凉山边缘地区有了集市，就连凉山腹地也有了集市的发展。这就很好的证明，集市数量的增加反映了商业的发展。<sup>②</sup>

某些自然地理要素也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如朱圣钟的报告根据有关资料对历史时期凉山地区的地震进行了详细统计，得出结论：从空间分布来看，西昌、越西、盐源、盐边、冕宁、雷波一带为凉山地区主要地震发生地带。<sup>③</sup>

## （二）历史学研究方法

首先要注意历史背景分析。与历史地理有关者，主要有政治军事形势分析、职官制度分析、行政制度分析等。

唐代姚州都督府是管理洱海地区乌蛮、洱河蛮羁縻州的重镇，其重建年代，唐代史料有垂拱元年和四年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一时难以断定。经仔细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发现在垂拱四年的次年，即永昌元年，洱海地区的浪穹部等二十五个乌蛮、洱河蛮部落从吐蕃回归唐朝。这二十五部本是

① 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第364页。

② 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第226~227页。

③ 朱圣钟《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第334页。

唐朝羁縻州，调露二年叛附吐蕃，姚州都督府即罢。由此不难看出，姚州都督府的复置，必与策划该二十五部回归有关，即当以垂拱四年为是，作“元年”者，当为“四年”之泐误。

窦滂《云南别录》云六诏之一为蒙越诏<sup>①</sup>，有人以为它就是施浪诏或蒙嵩诏，解释“蒙越”为“蒙赧”之误。按樊绰《云南志》卷三，开元中蒙舍诏之皮罗阁统一六诏，唐玄宗封其为越国公，故不如解释“蒙越诏”为开元后蒙舍诏之别称更合情理。

此外，史学方法中还常常要用到逻辑分析考证，即通常所说的考据方法，此不赘述。

### （三）政治学、法学研究方法

关于民族政治实体的性质界定，是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难题。比如唐宋时期以彝族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南诏、罗氏、罗甸、自杞等民族政权，虽然都被冠以国号，但究竟是独立国家还是唐宋王朝的藩属国或民族自治区，历史地图以怎样的边界处理它们，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及现代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原理进行研究。现将唐宋彝族政权国家要素列表分析如下：

<sup>①</sup>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引。

表 1 唐宋彝族国家政权要素分析

|                       |       |            |            |            |            |
|-----------------------|-------|------------|------------|------------|------------|
|                       | 国名    | 南诏         | 罗氏         | 罗甸         | 自杞         |
| 马克思主义<br>国家学说<br>国家要素 | 疆域    | 有          | 不详         | 不详         | 有          |
|                       | 阶级    | 有          | 有          | 有          | 有          |
|                       | 官僚    | 有          | 不详         | 不详         | 有          |
|                       | 军队    | 有          | 无          | 无          | 有          |
|                       | 监狱    | 有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 东亚文化圈<br>封建国家要素       | 君号    | 国王         | 鬼主         | 国王         | 国王         |
|                       | 年号    | 有          | 无          | 无          | 有          |
|                       | 都城    | 有          | 不详         | 不详         | 有          |
|                       | 疆域    | 有          | 不详         | 不详         | 有          |
|                       | 官僚    | 有          | 不详         | 不详         | 有          |
|                       | 军队    | 有          | 无          | 无          | 有          |
|                       | 与唐宋关系 | 无朝贡<br>无兼职 | 朝贡、<br>兼刺史 | 朝贡、<br>兼刺史 | 无朝贡<br>无兼职 |

按现代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的观点，独立国家是指拥有固定居民、确定领土、独立政权、独立主权的国家。政权是否独立，要看其是否具备完全的政治自主权。在中国封建社会，首先要看作为政权象征的最高元首的产生和继任是否受另一政权的约束；其次，在东亚文化圈中，还有君号与年号（即所谓正朔）是否自主等问题。以前有人认为，贞元以后，唐朝剑南节度使例兼云南安抚使，便意味着南诏放弃独立，归唐朝安抚司管辖。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南诏承认这种管辖的迹象，“安抚云南”不过是唐朝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南诏的独立自主地位是不容否认的。自杞国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是被作为宋代广南西路辖区内少数民

族割据势力处理的，而实际上无论按中国传统国家学说还是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自杞国都应算做独立国家<sup>①</sup>。罗氏、罗甸虽有国名，却长期与唐宋保持朝贡关系，封建史家认为朝贡即表示臣属，当代史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朝贡也是外交关系，未必表示臣属。但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即使不考虑朝贡关系，罗氏和罗甸作为独立国家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另外，西方政治学中关于国家起源过程的“酋邦”说，也可适用于某些羁縻属国、羁縻部落的研究。

#### （四）文献学研究方法

在近代以前，有关彝族历史地理的汉文专著非常少，除《华阳国志》、《云南志》、《土官底簿》等少数几部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外，大多散见于正史四夷传、地理总志和明清地方志之中。通过收集整理，我们发现其中可用于研究彝族历史政治地理的史料相对较多。比如，根据唐、宋有关史志记载，从考古、交通和地名对音研究入手，可推定唐宋时代彝族地区羁縻府州的分布范围及所在位置。又如，根据各地方志记载，参考方国瑜、龚荫等人的研究成果<sup>②</sup>，可复原改土归流以前彝族地区土司分布和具体位置。今举两例，说明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重要性。

唐代乌蛮羁縻州品州首县名，中华书局本《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作“从花”，《蜀中广记》卷三

<sup>①</sup> 参见刘复生《自杞国考略》，载《民族研究》1993年5期。

<sup>②</sup>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六作“茫化”，意俱难解，当依四库本《新唐志》作“从化”，取化行风俗、顺从德化之意。

《旧唐志》安南都护府载：“福禄州，龙朔三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獠昆明、北楼等七千余落。”《新唐书·南蛮传》（以下简称《新唐传》）载：“龙朔三年，矩州刺史谢法成招慰比楼等七千户内附。总章三年，置禄州、汤望州。”显然两书所记为同一件事，但招慰者身份、被招慰者、所置州名皆有歧异。经考，龙朔三年唐朝没有智州，故知北楼部落当在矩州附近，《旧唐志》不仅把矩州误写成智州，而且还误将禄州当成福禄州，进而将此事误系于安南。北楼、比楼，皆为同一乌蛮部落译名，不为误。彝族文献《夷书九则》、《普里本末》等载贵州有播勒土府，又称唵勒（白勒）太宗，是布（宓）氏支系慕雅克十九世孙默德阿仁所建，唐为之置普宁羁縻州，在今贵州安顺县境。<sup>①</sup>从而可以断定北楼即播勒<sup>②</sup>，所置为普宁州，而非禄州。

#### （五）地名学研究方法

地名是人文化石，含有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历史时期，汉文化周边民族地名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夷语地名（如彝语之点措白），一类是夷汉兼用地名（通名用汉语，专名用夷语，如点苍山；通名叠用夷汉，如诺矣江），一类是汉语地名。这三类地名的分布，与汉文化影响程度有关。也就

<sup>①</sup> 王正贤《彝族唵勒太宗初探》（上），载《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1期。

<sup>②</sup> 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第198~19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考证，北楼即宋代“毗那”、明代“比喇”，在今织县一带，亦为一说。

是说，汉文化影响不到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夷语地名；汉文化有一定影响的民族地区，是夷语地名和夷汉兼用地名并存；汉化民族地区，基本上是汉语地名。有些人对某些夷语地名和夷汉兼用地名习惯全用汉语词义、典故去解释，显然是不对的。

民族地名通常随部族移动。唐天宝、贞元年间，乌蛮羁縻州曲、协、靖等州因南诏的逼迫而北迁，州名亦随之移动（详见第一章第三节）。如果部族在原地不动，则地名大多可以长期保存，如云南禄劝、弥勒等县之名，皆始于元代乌蛮部落名<sup>①</sup>，至今未改。如果统治民族变动，原住土著民族不变，则新统治民族往往沿用原住民族地名，如南诏占领白蛮羁縻州后，即保留了不少原有名称，如弄栋、品爇、勃弄、阳睑（阳州）、大鳌（xī）睑（史州）、遼川（遼爇）等。以此剥茧抽丝，民族地名沿革不难理清。

云南富源县富村乡有彝语地名曰“迤左”（Yezu），一般以对音关系推断，认为其来源于元代罗雄州亦佐县，而笔者发现还可往前推至唐代的英州（参详第二章第三节）。此为以地名研究历史沿革之例。

《新唐志》载戎属羁縻州有谿（yí）罗州，旧不详所在。按《元史·地理志》：“和曲州，领二县：易笼，易笼者，城名，地名倍场。”此易笼即谿罗音转，在今云南禄劝县云龙（参详第三章第四节）。此为以地名研究城镇地理之例。

凉山州地区唐宋时犹有象，彝语地名明确反映从前有大象出没的地方是今甘洛县田坝区和美姑县牛牛坝区典补乡的

<sup>①</sup> 宋濂等《元史》卷六一《地理志》。

勒觉，“田坝”，彝语曰“娄地米（暖带密）”，意即“温暖、湿润、有大象的地方”，勒觉彝语意为“有大象的坝子”（参详第五章第三节“象川州”条）。此为以地名研究动物地理之例。

#### （六）考古学研究方法

据考古新发现的《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墓主爨子华身份是“大唐节度副使、南宁一十四州都督，世袭南宁郡王”，德宗贞元二年正月二日去世于嘉州<sup>①</sup>。以前认为自天宝末年南宁州都督爨守隅被南诏迁到河賧以后，爨氏遂灭；或是从南诏《德化碑》，认为至迟在永泰元年，曲、靖二州以南的爨部已被南诏完全占领，南宁州都督不复存在。现在可据以补充永泰以后爨氏历史。

现存于云南安宁市的《唐故河东县刺史王仁求碑》云：“初之将求宠于大国，以和其民人，招慰奏置姚府已西廿余州，俾睦其德。自前汉六代……时复废弃，但系羈縻。君以地形平衍，生殖丰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县以庶事。”这是研究洱海地区羈縻州建置沿革历史背景的很有价值的史料。

彝族城镇在历史文献中记载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古城遗址。如云南巍山县龙于图山发现的南诏城址，已证实其为樊绰《云南志》所载蒙舍诏早期都城所在地。同时，在其旁之庙街乡古城村

<sup>①</sup> 王方《成都市南郊桐梓林村唐代爨公墓发掘》，载《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书附录有校录。